

近百年來清史研究與內亞學之 發展

孔令偉*

關於中國歷代之國家性質及其延續興革，中外學界歷來多有論述，並圍繞此議題對不同歷史時期何謂「中國」概念，展開一系列學術研討。而在中國史研究中，清朝多元而複雜的政權性質，向來是學界爭論之焦點；近年來從內亞史乃至世界史格局重新檢視清朝史的研究風潮，無疑使得相關的學術討論愈加熱絡。本文重點回顧過往一百年來清朝與內亞史之推進，進而歸納近年相關研究發展之新趨勢，並提出清朝與內亞史研究之未來展望。

關鍵詞：清朝、內亞、晚期帝制中國、族群性、新清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言

作為中國從近世(early modern)過渡至現代(modern)的重要轉型時段，清朝政權的複雜性以及多元性歷來為學界所關注。就概念意義而言，「清朝」與「中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清代前後所謂的中國傳統，在概念範圍上是完全重合與沿襲，抑或有所變革及發展？歷史學界又如何能通過研究清史，重新檢視何為中國的思想議題？隨著近年來相關研究的拓展與深入，史學界已逐步認識到清朝政權在學習漢文化的同時，亦強調保持其統治集團之滿洲性(Manchuness)，並進而包納蒙古、西藏、回疆等來自內陸亞洲(Inner Asia，以下簡稱內亞)地區的多元文化。¹是以探索清朝之多元性質，內亞無疑係一關鍵的切入點。為開展並深化上述史學議題之探討，本文以長時段尺度回顧近百年來清朝與內亞史研究進程，歸結晚近學術發展之趨勢，並希冀將清朝放置在中國通史縱深的同時，亦通過歐亞史乃至世界史的跨域廣度，重新探索清朝性質乃至何謂中國的歷史議題。

關於清朝與內亞史之發展，隨著近三十年來美國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思潮的興起，及其所引發一系列學術爭鳴，獲得海內外學界的關注，對此前人已有回顧評述。²本文則另闢蹊徑，從長時段的史學史

¹關於滿洲性的討論，參：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² 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December 2004): 193-206; 黨為，《美國新清史三十年：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沈衛榮，《大元史與新清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蔡偉傑，〈美國「新清史」的背景、爭議與新近發展〉，收入吳世旭主編，《醫巫閭講座實錄》，第1輯(瀋陽：遼海出版社，2021)，頁287-316。

視野，重點回顧二十世紀初期迄今近百年來中、日、歐、美等國際學界在清朝及內亞史研究典範上的異同乃至互動。尤其關注脫胎自清代乾嘉考據學、西北史地之學的中國學人，如何與源自歐洲的東方語文學接觸，進而探究此學術思潮與近代國族主義發展、中日戰爭爆發、冷戰地緣政治對抗到全球化興起等諸多特殊時空脈絡間的錯綜交錯。中國與內亞的交錯，並非是清史特有的現象，而是貫穿中國通史之共性。眾所周知，中國史並非單純由漢人以及漢文化所構成。隨著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新史學的發軔與開展，何謂「中國」成為晚清、民初知識人所遭遇之重大思想問題。

在如是歷史背景下，史學諸家紛紛對於中國歷代政權性質的多元性，提出不同於傳統史學的多元見解。如 1918 年，傅斯年(1896-1950)便已認識到漢唐大一統格局下的「中國」，其統治本質並不盡然相承，進而在其氏著〈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中指出「漢代之中國，與唐代之中國，萬不可謂同出一族，更不可謂同一之中國」。³1931 年陳寅恪(1890-1969)在與傅斯年的學術討論中，亦首次提出「楊隋、李唐帝室之非漢姓」，進而撰成〈李唐氏族之推測〉一文，最終發展為其謂「關隴集團」的一家之言。⁴除了傅斯年、陳寅恪等受到歐洲實證史學、語文學影響的考訂派史家外，錢穆(1895-1990)等傳統派學人對於「中國」亦有程度不等的反思。如 1930 年代錢穆在寫作《國史大綱》時，便指出上古時期中國胡漢雜居，進而批駁「舊說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各

³ 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 4 月 17 日，第四版；1918 年 4 月 18 日，第四版；1918 年 4 月 19 日，第四版；1918 年 4 月 20 日，第四版；1918 年 4 月 22 日，第四版；1918 年 4 月 23 日，第四版。

⁴ 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1(北平，1931)，頁 39-48；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北：里仁書局，1980)。

遠居四裔，而諸夏在中原；此觀念殊不可恃」。⁵由此可見傅斯年、陳寅恪、錢穆等民國初年的史學大家，皆十分關注中國歷代政權的統治、族群與文化多元性。⁶由此可見，二十世紀前期華文學界在論述上古以及漢唐中國史時，業已正視內亞因素在中國歷代所扮演之歷史角色，其中尤以陳寅恪所提出之關隴集團說為代表。陳氏之說雖不無反對、修正者，但相較之下更廣為中國中古史學界徵引、完善，並影響杉山正明等日本東洋史學者的「拓跋國家」論述。⁷

相較中國史中的其他斷代傳統，清史學界對於內亞特性在清朝政權中發揮的作用，不僅在大方向上長期未能取得相對明確之共識，甚至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起，從美國學界開始產生所謂的新清史爭議，使得主張漢化(Sinicization)與族群性(ethnicity)等不同觀點的學者，在史觀見解上日益兩極化，影響迄今三十餘年，仍方興未艾。⁸與陳寅恪關隴集團在南北朝史、隋唐史領域中的接受度甚至權威性相比，清朝的內亞維度之所以在學界產生如此重大之認知落差，究其根柢，與二十世紀初

5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頁 65。

6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新史學》，31：1(臺北，2020)，頁 70-71；孔令偉，〈《國史大綱》與域外思想〉，收入王汎森、王健文、孔令偉、丘文豪、徐兆安、高震寰、許凱翔、游逸飛、傅揚、鄭丞良、閻鴻中，《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頁 166-203。

7 傅樂成，〈陳寅恪、岑仲勉對唐代政治史不同見解之比較研究〉，收入傅樂成著，《中國史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5)，頁 62-63；黃永年，〈關隴集團到唐初是否繼續存在〉，收入黃永年著，《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69-182；杉山正明，《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民族も国境もこえて》(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2011)。

8 黨為，《美國新清史三十年》；沈衛榮，《大元史與新清史》；蔡偉傑，《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新北：八旗文化，2020)。

期以降國族主義史學書寫在中國的興起，有錯綜複雜之干係。是以探討晚近學界就清朝統治性質之爭議，有必要事先廓清百年來中外學界關於清朝與內亞史研究之源流。

二、二十世紀前期中國史學界與歐洲東方學界

華文學界對於清朝內亞性的爭議，與國族主義的歷史書寫可以說是息息相關，其一方面繼承晚清革命黨人遺產，另一方面遭遇中日戰爭變局之故。如錢穆《國史大綱》作為一部中國通史巨作，無疑自成一家之言，然其歷史書寫具有強烈厚古薄今之傾向，尤其是將清朝貶斥為排擠、利用漢人之「狹義的部族政權」，與其說是客觀之歷史事實，不如視為錢穆個人之主觀詮釋。

錢穆對於清朝政權，以及滿洲與蒙藏勢力之交往，抱持相對負面之歷史評價，並視之為打壓、猜防漢人之手段。⁹這種觀點一方面肇因於其身處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中日戰爭之歷史背景，有意無意間將日軍侵華之國族悲痛，投射在滿洲入主中原之歷史記憶上。¹⁰另一方面，錢穆對清朝內亞性的消極態度，亦與晚清革命黨人的政治宣傳不無關聯。錢穆晚年在《師友雜憶》中自承 1904 年他十歲時，就讀於晚清無錫的新式小學，學校中有一位體育老師錢伯圭(1883-1947)係革命黨人，對於年幼的錢穆在思想曾有深刻的影響。一日錢伯圭曾問錢穆：「汝知今天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錢穆回家後向父親求證此事，其父答道：「師言是也。今天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則是漢人，你看街上店鋪有滿漢云云字樣，即指此。」這幾番對話，使得錢穆童稚

⁹ 錢穆，《國史大綱》，頁 338-342、352-354。

¹⁰ 孔令偉，〈《國史大綱》與域外思想〉，頁 171-178。

的心靈產生極大的震撼。¹¹錢穆童年的國族啟蒙，一方面解釋其反滿思想之根源，另一方面卻也正體現出清朝統治之特殊性：清朝統治者通過禁毀書刊以及言論箝制，有意識地抹去滿漢對立的歷史記憶，甚至造成清代知識人普遍自我審查的政治心態。¹²然即便清朝政府刻意模糊、淡化滿洲人征服明朝的歷史記憶，滿漢間的文化畛域在社會上仍隱約存在，並未澈底消失。而這種存在清朝體制中潛在的滿漢差異，也成為晚清革命黨人反滿宣傳的著力點。

稍早於錢穆與錢伯圭的談話，1903年鄒容(1885-1905)在《革命軍》中倡導「皇漢」思想，提出「驅逐住居中國中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的說法。¹³如此激烈的種族主義思想，固然主要係為革命政治需求服務，卻為後來以漢人為主體，進而排斥異族的中國近代國族主義歷史書寫種下遠因。1906年汪精衛在〈駁革命可以招瓜分說〉中猛烈批判清廷：「持鎖國主義，孤立無鄰，謂之自棄可耳。」¹⁴隨著汪精衛此文廣為流通，以及孫文等人的肯定與背書，「閉關鎖國」最終成為晚清、民初革命派作者詮釋清朝統治的套路。¹⁵

然而在革命黨人之外，二十世紀的傳統派以及考訂派歷史學者，亦不乏關注清朝之內亞屬性者，其中尤以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1877-1927)、陳寅恪具代表意義，並具體體現在他們對滿、蒙、藏文史料之

11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頁36。

12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2013)。

13 鄒容，《革命軍》(上海：民智書局，1928)，頁50。

14 汪精衛，〈駁革命可以招瓜分說〉，《民報》，第6號，1906年7月25日，第17-39頁。

15 林穎鈺，〈民氣可用：從「革命瓜分論戰」看晚清的民氣論述〉，《成大歷史學報》，52(臺南，2016)，頁209-238。

重視。1922 年羅振玉在與王國維的通信中，述及當時內閣大庫整理心得，感慨「庫籍中滿蒙文書為第一，惜無通其文者」，因此計畫令其子弟學習蒙古文以解讀這批史料。¹⁶同年王國維在致馬衡(1881-1955)信中，則又提及：「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此在我國所不可不設者。」¹⁷陳寅恪則是 1920 年代在德國留學期間，從黑尼士(Erik Haenisch, 1880-1966)等東方語文學者習得滿、蒙、藏文字，並在 1923 年〈與妹文〉中，自述其治學心路，強調「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¹⁸

羅振玉、王國維以及陳寅恪等民初中國學人之所以重視清史與內亞史二者間之密切性，一方面固然與其對乾嘉舊學的把握有關，但另一方面他們與當時歐洲東方語文學界的交往則顯得更加關鍵。如羅、王二人與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多有過從，陳寅恪本人更是留學德國、美國多年。要言之，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史學界對於清朝內亞因素的關注，與十九世紀後期發軔於歐洲的東方語文學(Oriental philology)關係密切。¹⁹

自十七世紀上半耶穌會士與滿洲統治者產生接觸，歐洲學界便已逐步開始蒐集滿文資料。²⁰隨著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繆勒(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 1705-1783)、克拉波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等早期歐洲東方學者的開拓，十八、十九世紀法、德諸國學者皆已運

16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第 723 通，頁 535。

17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第 15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頁 808。

18 陳寅恪，《書信集》(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 2。

19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頁 53-102。

20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用滿文文獻進行研究，並取得碩果；而俄羅斯更是由於地緣因素，曾從清朝方面獲得大量的滿文檔案、地圖與書籍，由此成為收藏、研究滿文文獻的一大重鎮。²¹二十世紀初，以伯希和為代表的歐洲東方學者，積極通過運用審音勘同的語文學方法，研究過去漢學家未能充分關注之梵、藏、突厥、蒙古、滿洲等多語種歷史文獻，發掘域外文化對傳統中國之關鍵影響，迅速取得超越過往傳統漢學之學術成果。²²歐洲東方學的興起，使得羅振玉、王國維、陳寅恪等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學人，紛紛重視以非漢文史料治清史乃至中國史。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傅斯年於 1928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草創之際，便振臂疾呼中國學者應重視以語文學研究域外文字之「虜學」，並高倡「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弘大願景。²³

在傅斯年、陳寅恪等人的引導下，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初期以史語所為代表的中國學術界，確實也在所謂虜學上取得一定的成果，並在相當程度上推動清朝與內亞史的發展。陳寅恪自 1926 年返回中國後，更是先後運用清宮舊藏滿洲、蒙古文書，陸續於 1931 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蒙古源流作者世系攷〉等清朝與內亞史相關研究，至今仍具參考價值。²⁴

21 孔令偉，〈日本、日耳曼的滿語文研究與近世歐亞〉，《讀書》，2019：5(北京，2019)，頁 160-170。

22 Hartmut Walravens, *Paul Pelliot (1878-1945): His Life Works - A Bibliogra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2001)；沈衛榮，《回歸語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23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北平，1928)，頁 3-10。

24 陳寅恪，〈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北平，1931)，頁 281-282；陳寅恪，〈蒙古源流作者世系攷(蒙古源流研究之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北平，1931)，頁 310-311。

受到陳寅恪等人的啟發，二十世紀三〇、四〇年代亦有中國學人留意清朝之內亞性，並著眼於滿、蒙、藏文對清史研究之重要性。于道泉(1901-1992)在陳寅恪、傅斯年等人的賞識下，於 1928 至 1934 年間入史語所任助理研究員，期間並與趙元任(1892-1982)合作，採集、譯注《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於 1930 年由史語所出版，列為單刊甲種之五。²⁵又如鄭天挺(1899-1981)曾受到陳寅恪考證域外史地人名之啟發，從而留心考證清代史料中的滿語文詞彙，其謂：「近陳寅恪先生於《讀書通訊》論史乘胡名考證之要，讀之心喜，因取清史習見滿語加以詮釋，明其本義，申其蘊潛。」²⁶

史語所主導下引進近代中國學界的語文學，雖然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前半，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然而隨著 1937 年中日戰爭以及 1945 年國共內戰的爆發，甫在中國學術界萌發的語文學，倏忽失去安穩發展之條件。如陳寅恪在中日戰爭中痛失多年來積累關於《蒙古源流》之研究手稿，自承不得不放棄域外之學而專心轉入唐史。又如于道泉因其個人傾向支持中共之政治意識型態，從而脫離傅斯年主導之史語所。內外戰爭下的種種歷史偶然，造成語文學傳統最終未能在近代華文學界生根茁壯。²⁷二十世紀四〇年代以後中國學界與語文學傳統失之交臂，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來清朝與內亞史研究的學術走向。而深究其因，中日戰爭不只摧毀了當時中國學界利用圖書文獻的外部條件，更加深了中國國族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史觀間的矛盾，直接導致內亞成為清史研究中的爭議點。

25 于道泉譯注，趙元任記音，《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

26 鄭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 114。

27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頁 53-102。

三、中國與日本史學界的交往到互斥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地緣政治矛盾，阻擾了語文學在中國學界內部的發展，更同時助長中日雙方國族主義以及帝國主義主導下的歷史書寫。這不僅扼殺中日學界間的平等交流，也為當時的清史與內亞史研究設下政治化的意識形態障礙。二十世紀一〇、二〇年代，中日史學界的交往頻仍，並在史學思想上互有積極意義之影響。如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於 1911 年至 1916 年間隨羅振玉寓居日本京都，期間多與內藤湖南(1866-1934)、狩野直喜(1868-1947)、藤田豐八(1869-1929)、鈴木虎雄(1878-1963)等日本學人相過從，在學問交流上深有所獲，故王氏自承旅居京都期間「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²⁸王國維在日本的學術經驗，相當程度上體現出當時中日史學界之交往風氣。

在王國維個人著述之外，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學界興起的疑古思潮，更是與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以後中國興起的古史辨運動，有著微妙的思想通同。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東洋史學界興起重新檢視中國古史起源之思潮。1902 年那珂通世(1851-1908)引介、點校與詮釋乾嘉考據學者崔述(1740-1816)的《考信錄》，而崔述的疑古辨偽之學，也為近代日本的疑古風潮提供思想上的源泉。²⁹1909 年，曾師事那珂的白鳥庫吉(1865-1942)提出「堯舜禹抹殺論」，懷疑中國上古三代的真實性。³⁰另一方面，

28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收入清華大學國學院編，《趙萬里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頁 21。

29 那珂通世，〈考信錄解題〉，《史學雜誌》，13：7（東京，1902），頁 50-61；崔述著，那珂通世點校，《崔東壁先生遺書》（東京：目黑書店，1903）。

30 白鳥庫吉，〈支那古傳說の研究〉，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集》，第 8 卷（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381-391。

白鳥對日本傳統「神代」與「皇道」史觀亦有所懷疑。白鳥的弟子津田左右吉(1873-1961)更是在 1913 年出版《神代史的新研究》，將《古事記》及《日本書紀》視為神話而非信史，隨後形成所謂「神代史抹殺論」。³¹

在那珂、白鳥等東京學派的學者外，內藤湖南等京都學人提出相對應的疑古思想。除了曾與那珂通世探討崔述《考信錄》其人其書外，內藤湖南在 1921 至 1922 年間更是發表〈尚書稽疑〉、〈禹貢製作的時代〉，認為中國上古史記載多係後人增飾，即其所謂「加上原則」。³²

巧合的是在中國方面，顧頡剛亦自 1921 年起通過點校崔述《考信錄》受到其疑古思想的啟發，³³復於 1923 年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歷史「層累說」，正式高舉中國古史辨運動的旗幟。³⁴此後，其他中國學者更從崔述《洙泗考信錄》和《讀風偶識》獲得啟迪，進一步發展對傳統經學與古史的批判性分析，如張壽林(1907-?)批判孔子編訂《詩經》之說，錢穆則挑戰孔子撰寫《易傳》的傳統觀點。³⁵由此可見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中國學界亦藉由學習崔述的考證精神，對傳統儒家經學進行深刻的重新審視與解構。關於中國的古史辨運動是否曾直接受到日本的疑古思潮影響，學界迄今尚無定論。³⁶惟可以確

31 津田左右吉，《神代史の新しい研究》(東京：二松堂書店，1913)。

32 內藤湖南，〈尚書稽疑〉、〈禹貢製作の時代〉，收入內藤湖南著，《內藤湖南全集》，第 7 卷(東京：筑摩書房，1970)，頁 9-23、頁 165-171。

33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1987)，頁 36-40。

34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讀書雜誌》，9(北京，1923)，頁 3-4。

35 李長銀，〈崔述的「考信之學」與「古史辨運動」〉，《青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青島，2019)，頁 75-84。

36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頁 53；錢婉約，〈「層累地造成說」與「加上原則」——中日近代史學上之古史辨偽理論〉，《人文論叢》，1999：

定的是，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中日學界在研究取徑上，尤其就疑古思想以及文本批評的史學研究取徑而言，具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故在討論〈禹貢〉年代爭議上，王國維便認為顧頡剛的觀點「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白鳥庫吉)略同」。³⁷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雙方在容受西方實證史學的過程中，皆通過重新詮釋崔述等乾嘉史學著作，形塑新興之史學思想。

然而近代中日學界在發展疑古思想上的相似軌跡，就清朝與內亞史研究而言，最終並未促成雙方間的積極學術交流，反而因兩國之間在東北亞地緣政治上的摩擦，而相互排斥。有別於強調「大一統」的中國傳統史學，明清鼎革的時代背景，使得江戶日本儒學者發展出「華夷變態」之說，用以詮釋滿洲以外族入主中國的歷史巨變，³⁸這種將滿洲與傳統中國進行一定區別的史學思想，影響後世日本學界史學研究的發展，迄今未歇。³⁹另一方面，在疑古思想的帶動下，二十世紀前期的日本東洋史學者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大一統」論述多有反思，主張清朝並非傳統中國漢文化所構成的單一同質整體，而是由滿洲、

0(武漢，1999)，頁 436-447；盛邦和，〈上世紀初葉日本疑古史學敎論〉，《二十一世紀》，36(香港，2005)，頁 1-13；楊鵬、羅福惠，〈古史辨運動與日本疑古史的關聯〉，《探索與爭鳴》，3(上海，2010)，頁 25-29；竹元規人，〈顧頡剛の疑古學說と同時代日本の諸説との比較〉，《九州中国学会報》，52(福岡，2014)，頁 61-75。

37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325-326。

38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東京：東洋文庫，1958-1959)；眞壁仁，〈徳川儒學思想における明清交替：江戸儒學界における正統の転位とその変遷〉，《北大法学論集》，62：6(札幌，2012)，頁 1359-1418。

39 杉山清彦，〈大清帝国史研究の現在：日本における概況と展望〉，《東洋文化研究》，10(東京，2008)，頁 347-372；程永超，〈華夷變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關係史の研究〉(大阪：清文堂，2021)。

蒙古主宰之政權。與此同時，出於對東北亞現實地緣政治的興趣，日本帝國在 1904、1905 年日俄戰爭以後，便著手投入滿蒙問題之研究。至於 1932 年滿洲國成立後，日本政府以及學界，因現實利益以及地利之便，更是大力投入滿蒙史研究。⁴⁰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受到西方實證主義史學、語文學啟發，並主導日本疑古思潮的東洋史學者，諸如那珂通世、白鳥庫吉、內藤湖南等人，莫不先後投入滿蒙史研究的行列，並試圖對清朝與內亞史提出宏觀性的歷史解釋框架。⁴¹如 1926 年白鳥庫吉提出「南北對立論」，主張東洋史之發展進程，在於北方胡人與南方漢人勢力的對抗，其中滿人征服明朝即為其中一環。⁴²白鳥這種將「胡／漢」、「北／南」視為二元對立的觀點，也成為爾後日本滿蒙史學界的基調。

以白鳥為代表的部分日本學者，或因為個人意識形態，或因為與日本軍部、政界的關係，生產出與日本帝國的大陸政策同步之系列研究。⁴³其中矢野仁一(1872-1970)於 1922 年提出的「滿蒙藏非支那本來之領土論」，便是最為顯著的例子。⁴⁴這類將滿蒙藏等內亞地區，視為不同於中原本部(China proper)的歷史觀點，固然並非全無歷史依據；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類高度政治化的歷史觀點，為配合日本帝國的大陸政

40 林志宏，〈殖民知識的生產與再建構——「滿洲國」時期的古物調查工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7(臺北，2015)，頁 1-50。

41 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第 1 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

42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対立〉，《白鳥庫吉全集》，第 8 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 69-84。

43 葛兆光，〈亞洲史的學術史：歐洲東方學、日本東洋學與中國的亞洲史研究〉，《世界歷史評論》，2(上海，2021)，頁 3-68。

44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論》(東京：弘文堂，1923)。矢野與日本軍部的往來，及其政治興趣，見：宮崎市定，〈矢野博士の追憶〉，《矢野仁一博士追悼錄》，附於《東洋史研究》，28：4(京都，1970)，頁 36-37。

策，亦偏向強調清朝的滿蒙特性而忽略其對漢文化正統性的繼承，以強調其不同於中國史中其他漢人政權。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學者因時局變化，廣泛關注東北史地，並開始積極批駁矢野、白鳥等日本滿蒙學論述，以強調中國領有東北三省主權之歷史依據。其中，傅斯年於1931年寫成之《東北史綱》第一卷即是代表之作。⁴⁵而為了批駁日本學界將「滿蒙」視為在政治、地理、文化等層面上獨立於傳統中國之外的觀點，傅斯年刻意在《東北史綱》中強調以中國之「東北」稱呼遼東，而不用西方以及日人習稱之「滿洲」(Manchuria)指涉此內亞地理空間。⁴⁶傅斯年之所以刻意強調此地理空間乃是中國的「東北」，其用意顯然在駁斥當時日本學界強調「滿洲」在文化及地理上自成一格，甚至自外於中國的論述。由此可見，所謂以「東北」非難「滿洲」之說，實為在日本大陸政策及滿洲國建立的時空背景下，傅斯年因中國國族主義思想所進行的創造及詮釋。

傅斯年之所以倡議「虜學」，強調通過滿、蒙、藏文而重新發掘中國史之重大議題，就純粹意義上的學術旨趣而言，與留學德國的白鳥庫吉相似，皆是受到當時歐洲流行之東方語文學的啟發。然由於中日政治立場以及國族認同的差異，加諸中日戰爭等因素，中日學界對

45 清水美紀，〈1930年代的「東北」地域概念の形成——日中歴史學者の論争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植民地研究》，15(東京，2003)，頁37-53；葉碧苓，〈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史學界對日本「滿蒙論」之駁斥——以《東北史綱》第一卷為中心之探討〉，《國史館學術集刊》，11(臺北，2007)，頁105-142；林志宏，〈近代中日的「滿蒙」論争：知識與政治為面向的考察〉，收入黃自進編，《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新北：稻鄉出版社，2016)，頁29-69。

46 傅斯年，《東北史綱》(收入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頁376。

於清朝與內亞的關係，最終形成了彼此互斥的立場。但也正因為來自日本的外部壓力，中國邊疆史地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受到中國學者嚴肅地關注，從而獲得突破性的發展。如 1934 年馮家昇(1904-1970)便因為時局刺激，積極由《遼史》入手，將研究視野拓展至中國東北史地。⁴⁷

在傅斯年、馮家昇等歷史學人的文獻研究外，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前後黃文弼(1893-1966)、顧頡剛(1893-1980)等學者曾前往中國西北進行考古學、民族學及歷史地理學等相關領域的實地調查。另一方面，馬鶴天(1877-1962)、林競(1894-1962)、劉文海(1894-1983)等國民政府官員亦根據自身考察見聞，發表有關西北邊疆的論述。⁴⁸與傅斯年對東北三省主權的強調相似，這類實地考察報告背後也具有建設邊疆的現實關懷，顧頡剛的西北考察便是其中典型實例。⁴⁹此後隨著 1937 年中日戰爭的爆發，顧頡剛更是在 1939 年高喊「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口號。⁵⁰在中日戰爭爆發的歷史脈絡下，傅斯年、顧頡剛等中國學者試圖通過淡化清朝的滿蒙特性，建構以中華民族為基礎的國族主義史觀，用以抗衡日本東洋史學界強調南北對抗的滿蒙史觀。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日本學者亦出現反思戰前大陸政

47 馮家昇，〈我的研究東北史地的計劃〉，《禹貢半月刊》，1：10(北平，1934)，頁 2-5。

48 沈松橋，〈江山如此多嬌——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歷史學報》，37(臺北，2006)，頁 145-216；陳學然，〈「重起爐竈」：民族危機與顧頡剛學術思想的轉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香港，2016)，頁 165-210；楊紅偉，〈西北考察與顧頡剛的民族思想〉，《江漢論壇》，4(武漢，2019)，頁 109-115；朱玉麒、王新春編，《黃文弼研究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49 顧頡剛遺稿，〈考察西北後的感想——關於中央政治學校附屬蒙藏學校(1938 年 10 月)〉，《西北史地》，2(蘭州，1984)，頁 12-16。

50 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益世報·邊疆週刊》，第 9 期，1939 年 2 月 13 日，第四版。

策影響下，將滿洲、蒙古乃至朝鮮總合統一的歷史觀點，而開始留意三者在本質論上的差異。⁵¹然而在檢討、批判軍國主義的同時，日本二十世紀前期的滿蒙學研究，無疑仍為戰後的東洋史學界留下具有價值的學術遺產。二戰結束以前接受東洋史學熏陶者，如島田正郎(1915-2009)等人，在戰後逐漸成為日本滿蒙研究的骨幹，並作出超越前人的研究業績，⁵²其學術成果對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以後國際學界關於清朝與內亞史研究之趨勢走向，尤其是對所謂的新清史思潮，造成相當影響。

四、美國內亞學之淵源

回顧過往近一世紀以來清史研究之發展，重視內亞維度(*Inner Asian dimension*)的「新清史」觀點，可說是備受矚目。關於新清史的起源，學界普遍追溯至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何炳棣(Ho Ping-ti, 1917-2012)與羅友枝(Evelyn S. Rawski)間的論爭，並有學者認為新清史具有「政治性質」，從而對其展開嚴厲批判。⁵³然中外學人圍繞新清史所產生的激烈辯論，實際上往往因學術話語體系落差，而產生彼此誤讀的現象。新清史的異軍突起，其實不應被簡單化約為一種政治化傾向，背後實有錯綜複雜之學術史淵源，需詳細梳理。而美國學界從內亞視野研究清代中國，亦非肇始

51 神田信夫，〈滿洲・蒙古〉，收入史学会編，《日本歴史学界的回顧と展望》，第17冊(東京：山川出版社，1988)，頁2-4。

52 島田正郎，《北方ユーラシア法系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1)；島田正郎，《清朝蒙古例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2)；島田正郎，《明末清初モンゴル法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6)。

53 徐泓，〈「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北京，2016)，頁1-13；鍾燾，《清朝史的基本特徵再探究：以對北美「新清史」觀點的反思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8)。

於新清史。本文以下首先梳理美國內亞學(Inner Asian studies)之淵源，以便後續釐清新清史的學術脈絡。

美國學界對於內亞史的研究，發軔於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此間美國學界受到來自歐洲東方學和中亞語文學的主要影響，其中關鍵人物有柔克義(William Rockhill, 1854-1914)與勞佛(Berthold Laufer, 1874-1934)等人。更具體的來說，美國的東方學研究，與法國、德國學術傳統頗有淵源。例如出身美國的柔克義曾留學法國聖西爾軍校(Les écoles de Saint-Cyr Coëtquidan)，並在該地學習藏語文。⁵⁴至於勞佛原係德裔，在移民美國前已從萊比錫大學(Universität Leipzig)取得博士學位。⁵⁵

在歐陸學者當中，又以伯希和的學術遺產對美國學界影響最為重要。伯希和曾分別在 1926 以及 1928 至 1929 年間，受哥倫比亞大學以及哈佛大學邀請赴美講學。伯希和在美國期間，曾講授過中亞語文學方面的知識，如在哥大授課期間曾講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文字之相關研究。⁵⁶除了講學活動外，伯希和亦有美國弟子傳承學術衣鉢。如 1935 年柯立夫(Francis Cleaves, 1911-1995)便在哈佛燕京學社的贊助下前往巴黎留學，師事伯希和。柯立夫後返回哈佛大學任教，成為重要的蒙古學研究者，並奠定該校內亞研究的基礎。

伯希和、勞佛、柯立夫一類的語文學者，注重審音勘同之學，所學專門，故個人學術成就甚高，影響仍主要集中在內亞學領域內。相較之下，柔克義、魏復古(Karl Wittfogel, 1896-1988)以及拉鐵摩爾(Owen

⁵⁴ Kenneth Wimmel,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Scholar-Diplomat of the Tibetan Highlands*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3).

⁵⁵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Biographical Memoir of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38).

⁵⁶ Serge Elisséeff, "Paul Pelliot: 1878-1945,"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1 (1945): 11-15. 潘光旦，〈中國人與國故學〉，收入潘光旦著，《夢庵隨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頁 14。

Lattimore, 1900-1989)等人的學術成果，與現實關懷更為緊密。作為首位系統學習藏語文的美國人，柔克義除了學者的身分外，更是一位外交官，他曾於 1905 至 1909 年間出任美利堅合眾國駐大清國公使。柔克義的實務外交經驗，使得他對於西藏與清廷的交往歷史頗為留意，1910 年他在《通報》發表題為〈1644-1908 年拉薩達賴喇嘛與中國滿洲皇帝的關係〉(“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 1644-1908”)之長文，⁵⁷不僅是美國學界研究清代西藏史的先驅，在當時更具有實際的外交參考意義。

另一方面，拉鐵摩爾針對以蒙古為核心的內亞研究，亦頗能體現美國內亞學界的多元發展。具體來說，拉鐵摩爾的研究側重田野調查及宏觀解釋，與專精文獻的歐洲東方學傳統，具有相當差異。拉鐵摩爾在二十世紀二〇、三〇年代，曾多次前往新疆、內蒙以及滿洲等地進行調查，並因他對中國邊疆事務之嫺熟，在四〇年代受聘為蔣介石之顧問。在中國的實際經驗，使得拉鐵摩爾在結合現地考察與文獻史料的基礎上，提出獨到觀點。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拉鐵摩爾也關注滿洲史地，並在 1932 至 1940 年間出版專書，提出邊疆地帶(frontier zone)的理論。不同於白鳥庫吉等日本學者多以長城邊境線劃分南北二元對抗，亦有別於傅斯年以華夏為核心的中國「東北」說，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等著作中，強調滿洲、蒙古等中國邊疆地帶係複雜、混合的多重區域，同時也是國家軍事力量的貯存地(reservoir)，在游牧與農業文明之間扮演關鍵的中介角色。例如清代的內蒙古，一方面既是國家對外邊疆的軍事藩籬，另一方面又是帝國內部官員的重要來源。⁵⁸換言之，滿洲、蒙古既是中國空間地理

⁵⁷ W. W. Rockhill, “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 1644-1908,” *T’oung Pao* 11:1 (1910): 1-104.

⁵⁸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上的邊陲，卻又是政治軍事上的核心。相較於當時中國及日本學者分別因各自意識形態所形成的二元對立史觀，拉鐵摩爾的解釋框架則更加強調國家力量、族群身分等不同層面的混雜性。

除了柯立夫、柔克義、拉鐵摩爾等出身美國的學者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包含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鮑培(Nicholas Poppe, 1897-1991)等歐陸學者移往美國從事內亞研究。這些歐陸移入的學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內亞學的發展，並持續至今。如伯希和匈牙利裔的學生塞諾(Denis Sinor, 1916-2011)，在 1961 年從英國劍橋大學轉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任教，開創該校中央歐亞研究(Central Eurasian studies)的基礎。另一方面，包含札奇斯欽(Jagchid Sechen, 1915-2009)、貢布扎布·杭錦(Gombojab Hangin, 1921-1989)以及薩迦達欽仁波切(Jigdal Dagchen Sakya Rinpoche, 1929-2016)等蒙藏人士，亦在二戰後前往美國大學執教，成為美國內亞學界重要的教學研究力量。⁵⁹

值得注意的是，二戰結束後直到冷戰落幕間，美國主要從事內亞學研究的研究人員，依據學科劃分散在中亞學、阿爾泰學與斯拉夫研究下，而並非集中在傳統漢學(Sinology)領域，這個現象很大程度上歸因於美蘇對立的冷戰地緣政治。這段期間美國內亞學人雖亦針對清朝與內亞史之相關議題，各自積累可觀的研究成果，整體學科發展卻屢遭挫折。如前述拉鐵摩爾的內亞邊疆學說，誠然有所發明，惜在麥卡錫主義陰影的籠罩下，拉鐵摩爾本人最終被迫轉往英國發展，對美國內亞研究的學科建制整體未能留下制度性貢獻。⁶⁰此外，柯立夫培養之

Company, 1932), 38-42;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40] 1962), 247-251.

⁵⁹ 蔡偉傑，〈當代美國蒙古學研究發展趨勢〉，《蒙藏季刊》，21：3(臺北，2012)，頁 86-105。

⁶⁰ 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弟子傅禮初(Joseph Fletcher, 1934-1984)，主攻清代新疆史、蒙古史，原繼柯立夫之後主導哈佛大學的內亞研究，卻英年早逝。⁶¹在年邁的柯立夫主持下，哈佛大學內亞與阿爾泰學委員會(Committee on 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得以維繫發展。相較於冷戰區域研究風潮下所興起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在美國專門由內亞視角研究清代中國者，人數不可謂多，並且分散在不同學科建制下。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後中美關係改變的脈絡下，中國近代海關史以及外交研究的時代意義，使得以費正清(John Fairbank, 1907-1991)為核心的中國研究一脈，於北美學界聲勢日隆。尤其在傅禮初逝世後，費正清所領導的中國研究頗有整併內亞學之雄心。⁶²整體而言，1945年至1991年間美國學術界專攻清朝與內亞史的學術工作，並非集中在中國研究或者東亞研究領域，反而與中亞研究、蘇聯學(Sovietology)更為接近。惟中國研究的崛起，亦使得費正清等中國史學者對內亞研究產生一定程度的關注。

1991年冷戰落幕，打破先前東亞與內亞研究獨立並進之局面，使得美國學界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明顯轉向。蘇聯的解體造成西藏、蒙古與中亞各國對美國不再具有現實戰略價值，最後導致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哥倫比亞大學減少乃至終止對內亞研究的投入，終僅剩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分校於1993年將原先烏拉爾—阿爾泰學系(Department of Uralic and Altaic Studies)轉型為中央歐亞學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成為今日美國唯一以蒙古、西藏與中亞地區為核心關懷的獨立系所。⁶³

Row, 1982), 335-340.

⁶¹ Joseph Fletcher,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ed. Beatrice Forbes Manz (Aldershot: Ashgate Variorum, 1995), vii-x.

⁶² John K. Fairbank, "Joseph F. Fletcher, Jr., 1934-1984," *Central Asian Survey* 4:2 (1985): 129-133.

⁶³ 孔令偉，〈如何看待美國學者筆下的中國邊疆史？〉，「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konglingwei/2019_11_28_526634.shtml，擷取日期：

五、美國新清史之緣起

今日提及新清史的主要屬性，多數人大概會將其籠統歸納為強調滿洲性，或者非漢文史料的運用。然而接續上節的討論，可知早在 1990 年代新清史出現前，美國的內亞學界便已經廣泛地關注滿洲性以及非漢文史料。那麼新清史新在何處？其緣起為何？又其為何引發學術爭議？接續上節對美國內亞學的討論，以下將在前人回顧的基礎上，⁶⁴ 進一步釐清新清史在美國之緣起，尤其放置在冷戰以後中國研究與內亞學這兩個學科的發展與消長脈絡下，進行學術史梳理。

相較於前述主要承襲歐陸東方語文學傳統的內亞學，今日風行學界的新清史，實際上脫胎於美國冷戰前後所發展出的中國研究。至於二十世紀美國中國研究討論清朝統治性質時，漢化論多居於主流地位。美國中國研究的漢化論，可以追溯至 1942 年梅谷(Franz Michael, 1907-1992)討論滿洲統治中國緣起之專書，其中主張清朝之所以能成功統治中國，在於滿洲人充分吸收漢文化。⁶⁵不同於梅谷從漢化論解釋清朝的觀點，魏復古在 1949 年提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理論，在強調遼、金、元、清武力征服中國性質的同時，亦根據其對漢文化的交流程度進行不同分類。

魏復古的征服王朝論，主要貢獻在於跳脫傳統漢化論者單向同化(assimilation)的窠臼，而是改由涵化(acculturation)觀點闡釋征服王朝與

2019 年 11 月 28 日。

⁶⁴ 蔡偉傑，〈美國「新清史」的背景、爭議與新近發展〉，頁 287-316。

⁶⁵ Franz Michael,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Frontier and Bureaucracy as Interacting Forces in the Chinese Empi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2).

漢人臣民之間在文化上的互相影響。⁶⁶魏復古的征服王朝理論，雖然隨後受到戰後日本滿蒙學界的關注而獲得田村實造(1904-1999)等學人的詳細討論，⁶⁷但並未獲得美國清史學界的充分吸收。如芮瑪麗(Mary Wright, 1917-1970)在探討同治中興時，主張晚清朝廷之所以能在一系列社會動亂後仍延續其政權，接受儒家思想的漢化乃是關鍵。⁶⁸至於何炳棣更是在1967年於《亞洲研究學報》(*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發表著名的〈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雖然在術語上借鑒了魏復古的征服王朝以及涵化論，但在觀點上仍側重清朝在制度性上進行漢化並推崇程朱理學，從八旗封建走向中央集權，方得成為中國史上最為成功之征服王朝。⁶⁹

此後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以前，美國中國研究脈絡下的清史研究中，漢化論長期佔據主導地位，這與學術方法的訓練不無關係。作為一名傑出而多產的明清史家，何炳棣長於大量梳理漢文史料，並能結合歐洲史以及社會科學的比較觀點，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等諸多議題提出精闢之見解。然而相較於內亞史學者而言，非漢文獻以及滿蒙史自非其所長，加上當時中國開放、出版之檔案數量有限，故其主張漢化論雖成一家之言，但從今日看來亦非定論。

相較於因漢化論而黯淡的內亞視野，以費正清為代表的中國沿海

⁶⁶ Karl A. 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ê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⁶⁷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收入田村實造著，《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中編(京都：東洋史研究会，1974初版)，頁623-655。

⁶⁸ Mary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⁶⁹ Ping-ti Ho (何炳棣),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 (February 1967): 189-195.

海關研究，乃至其所提出的「衝擊—回應」理論，則備受學界矚目，並在冷戰期間成為美國的中國學乃至東亞研究的主流典範。隨著 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過去長期主導美國的現代化理論開始鬆動，並促成中國研究取徑的多元化。在這個背景下，美國的中國研究開始出現反思「衝擊—回應」模式的思潮，其中代表人物如柯文(Paul Cohen)所強調的中國中心論，亦即在西方現代性之外強調中國史本身的主體性。⁷⁰柯文的中國中心論推動了美國中國研究學界對於主體性議題的多元關注，這種思維邏輯挑戰西方現代性優於東方傳統的一元論述，同時也間接促成反思傳統中國漢文化單向影響周邊文化的漢化論述。

在柯文以「中國中心觀」回應費正清「衝擊—回應」論之外，美國的中國研究內部也出現反思漢化的一元論述的聲音。如 1996 年羅友枝獲選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後曾發表就職演講，後以〈再觀清代：論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為題刊登於《亞洲研究學報》，其論點主要挑戰何炳棣逾三十年前的漢化論，主張清朝統治之成功，關鍵並不在於全盤漢化，反而在於其能藉由帝國內部語文、宗教、文化的多元性，對滿、蒙、藏、漢、回等不同族群採取多元而靈活的文化政策。⁷¹何炳棣隨後在 1998 年發表〈捍衛漢化：駁羅友枝的「再觀清代」〉(“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批駁羅友枝對於漢化論的誤讀，尤其主張遼、金、元、清等征服王朝，

⁷⁰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⁷¹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November 1996): 829-850.

皆在意識形態上認同五德終始等漢文化正統論。⁷²此後對於何炳棣的辯駁，羅友枝未再進行答復。

羅友枝與何炳棣就清朝漢化與否的討論，需要放在二十世紀八〇、九〇年代美國東亞學界的整體脈絡中來理解。在此之前，主導美國學界的「衝擊—回應」論以及漢化論，其預設邏輯基本建立在線性的文明優劣預設基礎之上，暗示優越文明取代落後文明的歷史發展軌跡。如漢化論的清史書寫，主張滿人最初來自東北關外，文化水平遠較中原漢文化低落，待滿人入主中原一統天下後，為統治需求全面學習先進的中原文化，卻也造成其最終為漢人所同化。與漢化論的論證邏輯相似，「衝擊—回應」論認為晚清社會缺乏自主革新之動力，最終不得不藉由 1840 年英國之外力介入，方才將現代性帶入中國。就強調被研究對象的主體能動性而言，羅友枝對清朝滿洲性的關注，與柯文強調在中國發現中國史的觀點，可謂異曲同工。

在羅、何二人的學術爭辯後，美國的中國研究出版了一批強調從滿洲性重新檢視清史的著作，其中最富代表意義的，分別為：羅友枝《最後的皇族：清代宮廷社會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1998)、柯嬌燕(Pamela Crossley)《半透明之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身分》(*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1999)、路康樂(Edward Rhoads)《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2000)以及歐立德(Mark C. Elliott)《滿洲之道：八旗制度與清代的族群認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⁷²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February 1998): 123-155.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1)。⁷³由於這四本先後出版的清史著作，皆探討、涉及清代滿洲人的族群與身分認同，故蓋博堅(Kent R. Guy)在 2002 年於《亞洲研究學報》上發表〈誰是滿洲人？〉(“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的綜論書評，將其或稱為「滿洲研究四書」。⁷⁴隨後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更是於 2004 年在《激進史學評論》(*Radical History Review*)上發表綜合書評，將以上這些著作通稱為「新清史」。⁷⁵衛周安的評論，頗能把握二十一世紀初美國清史學界的走向，即擺脫中國近代國族主義史學對滿洲人的貶抑，並走出漢化論的窠臼，重新正視清代滿洲統治的複雜性。⁷⁶而這也是一般學界認為美國新清史的直接起源。

仔細考察前述所謂新清史四書，不難發現羅友枝、歐立德與柯嬌燕等人及其著作，在研究基調上具有大致的共性，即均強調滿文史料並重視滿洲的主位(emic)視角。就學科訓練背景而言，以上強調滿文史料重要性的新清史學人，主要仍出身於美國東亞研究脈絡下的中國史學科，並非專精於歐陸傳統東方語文學的內亞學研究者。但就具體的史學觀點乃至概念操作而言，所謂的新清史學者之間多有顯著差異，並不是一個緊密的團體。如蓋博堅在書評中已經指出，與歐立德主張使用「族群主權」(ethnic sovereignty)的觀點不同，柯嬌燕反對使用「族群」(ethnic

⁷³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⁷⁴ R. Kent Guy,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1 (February 2002): 151-164.

⁷⁵ 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193-206.

⁷⁶ 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193-194.

group)來指涉皇太極(1626-1643 在位)時期的滿洲人，因為「族群」乃帝國所界定之文化觀念，而滿洲人在建國初期仍較接近邦國而非帝國。⁷⁷就美國東亞研究的內在理路而言，所謂的新清史並不是一個自我認同明確的學術社群，因此柯嬌燕在 2014、2018 等年度多次接受訪談時公開表示：「『新清史』，英文是“New Qing history”。在美國，很少有人用『新清史』一詞來形容自己的作品，我自己一次也沒有用過。」⁷⁸柯嬌燕並否認自己屬於新清史，甚至認為並不存在外界所認為的新清史學派。⁷⁹換句話說，所謂的新清史並不是一個內部緊密的學術派別，而更像是他者賦予之身分標籤。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學界運用滿文研究清史的學者，並不必然屬於外界所認知的新清史。如前所述，早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中國研究出身的羅友枝、柯嬌燕、歐立德等學者前，美國內亞學界業已開始運用滿文研究清史。至於十九、二十世紀的歐陸、日本以及中國學界，更是早就關注滿文、蒙古文以及藏文等多語種史料，並強調非漢文史料對於理解清代中國的關鍵意義。也就是說「新清史」有其自身的特殊脈絡，其回應對象主要包含費正清、何炳棣等美國中國研究之前輩學人，而非更早之前便已存在歐陸、日本與中國學界的內亞研究傳統。

比起脫胎於美國東亞研究的新清史，美國的內亞研究者與歐陸傳統關係更加密切，其中代表性人物有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艾鷺德(Christopher Atwood)以及艾鴻展(Johan Elverskog)等，雖亦運用滿、蒙文史料研究清代內

77 R. Kent Guy,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153.

78 侯德仁採訪，〈柯嬌燕：我對「新清史」研究的保留意見〉，《中國社會科學報》，第 641 期，2014 年 9 月 1 日，第 A05 版。

79 劉山山採訪，〈柯嬌燕：我不屬於「新清史」〉，《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05137，擷取日期：2018 年 12 月 17 日。

亞史之相關議題，卻並不屬於新清史的學術範疇。例如狄宇宙明確自視為新清史的「局外人」，並指出重視非漢文史料「並不是新清史的發現」。狄宇宙亦認為二戰以後美國中國學下的清史研究，與歐洲、日本學術重視多語種史料的傳統剝離，尤其以費正清一派主要關注漢文文獻。因此所謂新清史其實是一種「各類舶來學術觀點的混合物」，體現美國清史學界試圖重新回歸國際舊有的清史傳統。⁸⁰

以上狄宇宙的評論，反映出美國內亞學與東亞研究這兩個學科傳統之間的微妙距離，並點出美國新清史重新關注清朝滿洲性的論點，實際上並非完全源自美國學界本土，而是有日本滿蒙學的淵源。如歐立德本人曾前往日本留學，期間師從岡田英弘(1931-2017)，進而接觸日本滿蒙史的研究傳統。⁸¹值得注意的是，新清史在吸收日本滿蒙史觀的前提下，亦造成相關史學問題：新清史的族群建構論述，與白鳥庫吉等日本學者建構之南北對立論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從而有將滿、漢視為二元對立之嫌。此外，在挑戰漢化論的同時，新清史在強調滿洲性的過程中，亦在有意無意之間建構出滿洲中心論。然而無論是漢化論抑或是滿洲中心論，皆是以北京的紫禁城為核心的歷史觀點，較少體現蒙古、西藏、新疆等多元族群視野。

⁸⁰ 賴毓芝訪談，〈專訪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教授〉，《明清研究通訊》，71(臺北，2019)，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701，擷取日期：2019年2月5日；羅新、鄭詩亮採訪，〈狄宇宙：絲綢之路的開端不是張騫，戰國就出現了〉，《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0061，擷取日期：2015年4月12日。

⁸¹ 孔令偉，〈王岐山說的岡田英弘是誰？〉，《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1629，擷取日期：2015年5月18日。

六、結語：近年清史與內亞史研究的趨勢與展望

隨著近百年來的學術發展，新清史著作的研究主題與範疇益加多元化，而不再侷限於滿洲中心論。在主要關注滿洲身分認同等議題的新清史四書外，蒙古、新疆與西藏亦成為新清史著作重要的探討對象；而探討議題也從八旗制度，拓展至軍事擴張、邊境貿易以及社會經濟等諸多面向。如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1998)對於清朝與新疆經貿的研究，⁸²濮德培(Peter C. Perdue)《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2005)對清朝與準噶爾戰爭的探討，⁸³皆顯示出新清史在滿洲研究之外的發展。此外，近年來越來越多青壯輩學者紛紛學習滿、蒙、藏、維等非漢語文，並投入清史研究的行列中。由於他們關注的議題較前輩新清史學者更加多元化，因此又被稱作「新清史 2.0」，以別於早期關注滿洲八旗史的學者。如馬世嘉(Matthew Mosca)的《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從資訊史、外交史的角度，剖析清朝對英屬印度的認識乃至邊疆政策的變化；⁸⁴歐楊(Max Oidtmann)《金瓶

⁸²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⁸³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濮德培著，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臺北：衛城出版，2021)。

⁸⁴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鑄就：大清帝國與活佛轉世》(*Forging the Golden Ur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從金瓶掣籤以及藏傳佛教轉世制度探討清帝國與西藏之關係，皆係其中佳作。⁸⁵此外，新疆研究(Xinjiang studies)亦成為近年清史學界迅速發展之領域，其中圖姆(Rian Thum)、博大衛(David Brophy)、金光明(Kwangmin Kim)、許臨君(Eric Schluessel)等人關於清代新疆之研究，不再單純將新疆視為中國的邊緣，而是試圖通過地方史料找尋地方社會主體性與清帝國統治間的互動。⁸⁶

在新清史思潮直接或間接的帶動下，近年清朝與內亞史研究有三點值得關注之趨勢，大致可歸結如下：第一，全球史思潮興起下，作為中國、俄羅斯、印度中間地帶的內亞，為重新從游牧史觀書寫世界史提供可能，如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帝國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邊疆》(*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將清代邊疆治理下的滿洲和蒙古環境史放置在十八、十九世紀全球皮草貿易的脈絡下來理解，便是其中一例。⁸⁷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馬世嘉著，羅盛吉譯，《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2019)。

⁸⁵ Max Oidtmann, *Forging the Golden Ur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⁸⁶ Peter C. Perdue, "Xinjiang Studies: The Third Wave,"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21 (December 2016): 137-156; Rian Thum, Justin Jacobs, Tom Cliff, David Brophy, Kwangmin Kim, and Madlen Kobi, "The Rise of Xinjiang Studies: A JAS New Author Foru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7:1 (February 2018): 7-18; Eric Schluessel, *Land of Strangers: The Civilizing Project in Qing Central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⁸⁷ Jonathan Schlesinger,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第二，立足東亞史的整體視野，書寫超越現代國族邊界之國際史。近年學界興起對跨界人群的關注，如宋念申《在現代東亞製造疆界：1881-1919 年圖們江勘界》(*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王元崇《重塑中華帝國：1616-1911 年間的滿鮮關係》(*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以及金由美《族群之蛹：中國的鄂倫春人以及清朝邊疆治理的遺產》(*Ethnic Chrysalis: China's Orochen People and the Legacy of Qing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圍繞東北亞地區之跨界族群從而探討滿洲、朝鮮、俄羅斯等地間的國際互動。⁸⁸以上研究從跨境視野重新將遼東、朝鮮邊疆詮釋為主體，進而探討東北亞位於帝國邊緣與核心之間的權力關係，為學界開展對東亞史的多元認識，提供新興可能。

第三，從比較史的多元觀點重新檢視清朝與內亞之關係。所謂的比較，應從時段、地域等不同層面分別進行綜合研究。從時段上來說，持續比較清朝與遼、金、元之間的異同，深化對征服王朝論的研究乃至發覆。就地域上來說，除了通過比較內亞、華南、海洋等不同視角下的清朝，⁸⁹也應進一步將清代中國放置在比較世界史的脈絡下，與印度、俄羅斯、土耳其等帝國進行比較研究。⁹⁰

⁸⁸ Nianshen Song (宋念申),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Yuanchong Wang (王元崇),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Loretta Kim, *Ethnic Chrysalis: China's Orochen People and the Legacy of Qing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9).

⁸⁹ 陳博翼，〈「重探『帝國』與『地方社會』——『華南研究』與『新清史』的對話」專號導言〉，《歷史人類學學刊》，15：2(香港，2017)，頁 2-15。

⁹⁰ Peter Perdue and Huri Islamoglu eds., *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 in China, India, and the Ottoman Empire* (Delhi: Routledge, 2008).

總結來看，近年來清朝與內亞史研究的學術前沿，無論是主題還是方法論，已經顯著超越早期新清史所關注的滿洲身分和八旗制度。隨著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區的納入，對清帝國的研究格局得以深化，而不再局限於滿洲中心的論述。此一發展不僅顯示出近年史學界對於清帝國多族群、跨疆域性質的全面理解，也反映隨著引入全球史和比較史研究方法，清史研究愈發走向跨區域和跨學科的綜合性探討。從以內亞為核心的全球視野，到跨境人群與邊界重新劃定的討論，愈來愈多的學者們透過豐富的地方史料、非漢語文獻乃至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等多元視角，重新審視清帝國在全球史中的獨特地位。未來的清史研究，有望進一步深化比較史與全球史的框架，促進清帝國與大英、沙俄、印度及土耳其等其他帝國間的對比研究，以此推動學界對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多維度的重新理解與詮釋。

(本文於 2023 年 8 月 21 日收稿；2024 年 11 月 6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執行國科會計畫(編號：NSTC 111-2410-H-001-005-MY3)、中央研究院關鍵突破種子計畫(編號：AS-GCS-112-H01)、國立臺灣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創新性合作計畫(AS-NTU-112-05)階段成果。各節部分內容，曾分別宣讀於 2023 年 5 月 11 日「三十而歷：中央大學歷史所創所暨臺灣近世史學研究三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以及 2023 年 10 月 21 日「中國新史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紀念梁啟超先生誕辰 150 週年」學術研討會，感謝皮國立、楊念群二位先生邀請與會，玉成筆者回望學術史之願。林宏哲、簡瑞瑩、鍾泓泰、張業祥、巫承興、陳冠傑諸君曾協助各階段文稿校對，一併致謝。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 《中國社會科學報》(北京)。
《北京大學日刊》(北京)。
《民報》(東京)。
《東方學會報》(東京)
《益世報·邊疆週刊》(昆明)。
《讀書雜誌》(北京)。

二、近人論著

- 于道泉譯注，趙元任記音，《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
- 內藤湖南，〈尚書稽疑〉，收入內藤湖南著，《內藤湖南全集》，第7卷，東京：筑摩書房，1970，頁9-23。
- 內藤湖南，〈禹貢製作の時代〉，收入內藤湖南著，《內藤湖南全集》，第7卷，東京：筑摩書房，1970，頁165-171。
- 孔令偉，〈《國史大綱》與域外思想〉，收入王汎森、王健文、孔令偉、丘文豪、徐兆安、高震寰、許凱翔、游逸飛、傅揚、鄭丞良、閻鴻中，《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頁166-203。
- 孔令偉，〈日本、日耳曼的滿語文研究與近世歐亞〉，《讀書》，2019：5(北京，2019)，頁160-170。
-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新史學》，31：1(臺北，2020)，頁53-102。
-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1987。
-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2013。
-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4。

-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 田村実造，〈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收入田村実造著，《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中編，京都：東洋史研究会，1974初版。
- 白鳥庫吉，〈支那古傳說の研究〉，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集》，第8卷，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381-391。
-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対立〉，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集》，第8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69-84。
-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論》，東京：弘文堂，1923。
- 朱玉麒、王新春編，《黃文弼研究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 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第1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
- 竹元規人，〈顧頡剛の疑古學說と同時代日本の諸説との比較〉，《九州中国学会報》，52(福岡，2014)，頁61-75。
- 杉山正明，《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民族も国境もこえて》，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2011。
- 杉山清彦，〈大清帝国史研究の現在：日本における概況と展望〉，《東洋文化研究》，10(東京，2008)，頁347-372。
- 沈松橋，〈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歷史學報》，37(臺北，2006)，頁145-216。
- 沈衛榮，《大元史與新清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沈衛榮，《回歸語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那珂通世，〈考信錄解題〉，《史學雜誌》，13：7(東京，1902)，頁50-61。
- 林志宏，〈近代中日的「滿蒙」論爭：知識與政治為面向的考察〉，收入黃自進編，《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新北：稻鄉出版社，2016，頁29-69。
- 林志宏，〈殖民知識的生產與再建構——「滿洲國」時期的古物調查工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7(臺北，2015)，頁1-50。
-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東京：東洋文庫，1958-1959。
- 林穎鈺，〈民氣可用：從「革命瓜分論戰」看晚清的民氣論述〉，《成大歷史學報》，52(臺南，2016.6)，頁209-238。
- 津田左右吉，《神代史の新しい研究》，東京：二松堂書店，1913。
- 宮崎市定，〈矢野博士の追憶〉，《矢野仁一博士追悼錄》，附於《東洋史研究》，28：

- 4(京都, 1970), 頁 32-38。
- 島田正郎, 《北方ユーラシア法系の研究》, 東京: 創文社, 1981。
- 島田正郎, 《明末清初モンゴル法の研究》, 東京: 創文社, 1986。
- 島田正郎, 《清朝蒙古例の研究》, 東京: 創文社, 1982。
- 徐泓, 〈「新清史」論争: 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 1 (北京, 2016), 頁 1-13。
- 神田信夫, 〈滿洲・蒙古〉, 收入史学会編, 《日本歴史学界の回顧と展望》, 第 17 冊, 東京: 山川出版社, 1988, 頁 2-4。
- 馬世嘉(Matthew Mosca)著, 羅盛吉譯, 《破譯邊疆・破解帝國: 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 臺北: 臺灣商務出版社, 2019。
- 崔述著, 那珂通世點校, 《崔東壁先生遺書》, 東京: 目黒書店, 1903。
- 清水美紀, 〈1930 年代の「東北」地域概念の形成——日中歴史學者の論争を中心として〉, 《日本植民地史研究》, 15(東京, 2003), 頁 37-53。
- 盛邦和, 〈上世紀初葉日本疑古史學敘論〉, 《二十一世紀》, 36(香港, 2005), 頁 1-13。
- 眞壁仁, 〈徳川儒學思想における明清交替: 江戸儒學界における正統の転位とその変遷〉, 《北大法學論集》, 62: 6(札幌, 2012), 頁 1359-1418。
- 陳寅恪, 〈李唐氏族之推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 1(北平, 1931), 頁 39-48。
- 陳寅恪, 〈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 3(北平, 1931), 頁 281-282。
- 陳寅恪, 〈蒙古源流作者世系攷(蒙古源流研究之四)〉,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 3(北平, 1931), 頁 310-311。
- 陳寅恪, 《書信集》, 收入陳寅恪著, 陳美延編, 《陳寅恪集》,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
- 陳寅恪,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臺北: 里仁書局, 1980。
- 陳博翼, 〈「重探『帝國』與『地方社會』——『華南研究』與『新清史』的對話」專號導言〉, 《歷史人類學學刊》, 15: 2(香港, 2017), 頁 2-15。
- 陳學然, 〈「重起爐竈」: 民族危機與顧頡剛學術思想的轉變〉,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6(香港, 2016), 頁 165-210。
- 傅斯年,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 1(北平, 1928), 頁 3-10。

- 傅斯年，《東北史綱》，收入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 傅樂成，〈陳寅恪、岑仲勉對唐代政治史不同見解之比較研究〉，收入傅樂成著，《中國史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5。
- 程永超，《華夷變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關係史の研究》，大阪：清文堂，2021。
- 馮家昇，〈我的研究東北史地的計劃〉，《禹貢半月刊》，1：10(北平，1934)，頁2-5。
- 黃永年，〈關隴集團到唐初是否繼續存在〉，收入黃永年著，《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楊紅偉，〈西北考察與顧頡剛的民族思想〉，《江漢論壇》，4(武漢，2019)，頁109-115。
- 楊鵬、羅福惠，〈古史辨運動與日本疑古史的關聯〉，《探索與爭鳴》，3(上海，2010)，頁25-29。
- 葉碧苓，〈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史學界對日本「滿蒙論」之駁斥——以《東北史綱》第一卷為中心之探討〉，《國史館學術集刊》，11(臺北，2007)，頁105-142。
- 葛兆光，〈亞洲史的學術史：歐洲東方學、日本東洋學與中國的亞洲史研究〉，《世界歷史評論》，2(上海，2021)，頁3-68。
- 鄒容，《革命軍》，上海：民智書局，1928。
-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收入清華大學國學院編，《趙萬里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頁1-52。
- 潘光旦，〈中國人與國故學〉，收入潘光旦著，《夔庵隨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頁14。
- 蔡偉傑，〈美國「新清史」的背景、爭議與新近發展〉，收入吳世旭主編，《醫巫閭講座實錄》，第1輯，瀋陽：遼海出版社，2021，頁287-316。
- 蔡偉傑，〈當代美國蒙古學研究發展趨勢〉，《蒙藏季刊》，21：3(臺北，2012)，頁86-105。
- 蔡偉傑，《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新北：八旗文化，2020。
- 鄭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 錢婉約，〈「層累地造成說」與「加上原則」——中日近代史學上之古史辨偽理論〉，《人文論叢》，1999：0(武漢，1999)，頁436-447。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

-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
- 濮德培(Peter C. Perdue)著，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臺北：衛城出版，2021。
- 鍾煥，《清朝史的基本特徵再探究：以對北美「新清史」觀點的反思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8。
- 黨為，《美國新清史三十年：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顧頡剛遺稿·〈考察西北後的感想——關於中央政治學校附屬蒙藏學校(1938年10月)〉，《西北史地》，2(蘭州，1984)，頁12-16。
- Cohen, Paul.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Crossley, Pamela Kyle.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Elisséeff, Serge. "Paul Pelliot: 1878-1945."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1 (1945): 11-15.
-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Fairbank, John K. "Joseph F. Fletcher, Jr., 1934-1984." *Central Asian Survey* 4:2 (1985): 129-133.
- Fairbank, John 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 Fletcher, Joseph.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edited by Beatrice Forbes Manz. Aldershot: Ashgate Variorum, 1995.
- Guy, R. Kent.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1 (February 2002): 151-164.
- Ho Ping-ti (何炳棣).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February 1998): 123-155.
- Ho Ping-t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 (February 1967): 189-195.
- Kim, Loretta. *Ethnic Chrysalis: China's Orochen People and the Legacy of Qing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9.
-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Biographical Memoir of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38.

-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 Lattimore, Owen.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2.
- Michael, Franz.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Frontier and Bureaucracy as Interacting Forces in the Chinese Empi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2.
- Millward, James A.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Mosca, Matthew.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Oidtmann, Max. *Forging the Golden Ur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 Perdue, Peter C. "Xinjiang Studies: The Third Wave."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21 (December 2016): 137-156.
- Perdue, Peter C. and Huri Islamoglu, eds. *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 in China, India, and the Ottoman Empire*. Delhi: Routledge, 2008.
-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Rawski, Evelyn S.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November 1996): 829-850.
-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Rhoads, Edward J. M.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 Rockhill, W. W. "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 1644-1908." *T'oung Pao* 11:1 (1910): 1-104.
- Schlesinger, Jonathan.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Schluessel, Eric. *Land of Strangers: The Civilizing Project in Qing Central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 Söderblom Saarela, Mårten.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 Song Nianshen (宋念申).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Thum, Rian., Justin Jacobs, Tom Cliff, David Brophy, Kwangmin Kim, and Madlen Kobi. "The Rise of Xinjiang Studies: A JAS New Author Foru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7:1 (February 2018): 7-18.
- Waley-Cohen, Joanna.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December 2004): 193-206.
- Walravens, Hartmut. *Paul Pelliot (1878-1945): His Life Works - A Bibliogra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2001.
- Wang Yuanchong (王元崇).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 Wimmel, Kenneth.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Scholar-Diplomat of the Tibetan Highlands*.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3.
- Wittfogel, Karl A. and Fêng Chia-shê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 Wright, Mary.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三、網路資料

- 孔令偉，〈王岐山說的岡田英弘是誰？〉，《澎湃新聞》，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1629，擷取日期：2015年5月18日。
- 孔令偉，〈如何看待美國學者筆下的中國邊疆史？〉，「觀察者網」，
https://www.guancha.cn/konglingwei/2019_11_28_526634.shtml，擷取日期：2019年11月28日。
- 劉山山採訪，〈柯嬌燕：我不屬於「新清史」〉，《澎湃新聞》，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05137，擷取日期：2018年12月17日。
- 賴毓芝訪談，〈專訪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教授〉，《明清研究通訊》，71(臺北，2019.2)，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701，擷取日期：2019年2月5日。
- 羅新、鄭詩亮採訪，〈狄宇宙：絲綢之路的開端不是張騫，戰國就出現了〉，《澎湃新聞》，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0061，擷取日期：2015年4月12日。

The Development of Qing Historiography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over the Past Century

Ling-wei Ku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cholars have extensively discussed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China, provoking a series of academic debates centered around the concept of “China” itself.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y, the diverse and complex n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has long been a focal point of these scholarly debate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trend of re-examining Qing history through the lens of Inner Asian history, and more broadly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world histo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Qing and Inner Asian historiography over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highlights recent trends in related research, and explores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 study of Qing and Inner Asian history.

Keywords: Qing Dynasty, Inner Asia, late imperial China, ethnicity, New Qing History